

人生没有白吃的苦

——读产改题材长篇小说《春天里》有感

刘志福

2022年,梁弓出版了产改题材长篇小说《明天会更好》,两年后,又推出同题材长篇小说《春天里》。两部作品人物上有重合,故事上有承接,因此可以把《春天里》视作《明天会更好》的续篇。

《明天会更好》的主人公桑向阳来自江州市南楚县,《春天里》的主要人物孙笑来自江州市安东县,前者在市总工会工作,后者在民营企业上班,二人看似毫无关系,事实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均出生于农村;都喜欢下围棋;婚恋上同样经历过波折。而且他们俩还被蒋蓉联系在一起:孙笑是桑向阳同事蒋蓉的丈夫。此外,孙笑弟弟孙乐的妻子桑向竹是桑向阳的本家妹妹。

桑向阳算是比较成功的,家庭和睦,儿子有出息,自己在单位任领导。与桑向阳相比,孙笑的境况实在不怎么样。

孙笑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父亲是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中考前夕,父亲意外去世了。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孙笑的人生轨迹。按说孙笑可以像桑向阳那样,上高

中读大学,父亲去世后,母亲考虑到各种因素,让他选择了中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专生还能端上铁饭碗,但孙笑生不逢时,毕业进入国企工作,没多久企业改制,铁饭碗没了。民企与国企不同,亲戚关系很重要,师父的对头在单位因此一时得势,处处与孙笑为难,还把他调到不熟悉的岗位,对孙笑打击很大。

工作不顺利,已经够糟心的了,关键是,家庭关系还不和谐。孙笑的妻子蒋蓉是他初中同学,一直仰视着他,因为孙笑企业改制,境况不如以前,而自己从学校进入机关工作,再一步步担任领导职务,对他越来越瞧不上,不断地加以嘲讽。在她眼里,孙笑几乎成了“废物”。孙笑与蒋蓉的结合,始终不被母亲看好,母亲讨厌蒋蓉,以至于婆媳间矛盾重重,这种情绪,自然而然迁怒到孙笑身上。母亲的这种态度,又影响到女儿孙欢,孙欢对哥哥孙笑也是满肚子怨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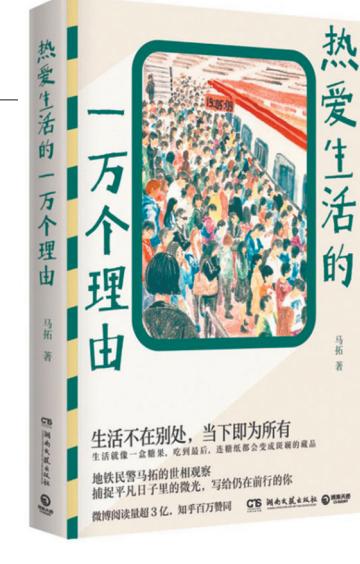
如果说母亲、妹妹的怨气,孙笑可以置之不理,甚至蒋蓉的挑衅,虽然孙笑处境不妙,毕竟还有人真正关心自己,比如说他的弟弟孙乐,比如说他的师父周知义,比如说师兄弟胡万春等人。再比如说市总工会领导桑向阳。桑向阳扎实工作,努力奋斗,工作上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桑向阳对孙笑非常照顾,去企业调研,点名请孙笑参加座谈会。大家的关心,让孙笑感觉很温暖,一直勉励自己,不能放弃。

孙笑的人生变化,有客观因素,但更得益于自身的努力。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大背景下,桑向阳、周知义大力推荐孙笑,引起新任董事长查安平的关注,查安平把孙笑调回电焊岗位,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终于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儿子孙念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父母婚姻破裂,厉害上门闹事,让孙念祖认识到生活的艰难,而父亲中学时的辉煌,以及换岗后的成就,对他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在梁老师的帮助下,在孙笑的辅导下,孙念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很快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甚至班主任吴老师也对他刮目相看。

成功的人,没有不经历磨难的,所谓风雨之后,才见彩虹,孙笑吃过苦,他的精神偶像桑向阳也吃过苦,最终大家走出困境,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辛勤付出,终有回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生同样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



在民警马拓的眼中,地铁站就像一幅浮世绘。安检员、站务员、商亭里做卷饼的大姐、卖伞的老奶奶……人潮涌动的北京地铁中,每个人都如此渺小庸碌,每个人却又都在用力活着。这些人,是他们,也是我们。正是无数个“我们”,构成这烟火人间的底色。愿你从这些文字中,见众生,见自己。

《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马拓/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地铁影后柳丽丽

柳丽丽常年在地铁站外卖手机膜。

作为一名地铁民警,我给过柳丽丽一个封号:地铁影后。

最开始柳丽丽和她老公一起摆摊贴膜。两人是老乡,感情特好,也能吃苦。后来买卖做大,她老公单飞,挪到另外一条街上占领高地,夫妻俩各摆一摊,生意不要太红火。

为什么柳丽丽一个弱女子能够在地铁站这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那教科书式的演技。

她原先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椅子,桌子上放一个纸板糊的贴膜招牌,往椅子上一坐,那就算是开张了。柳丽丽不算奸商,但也是靠忽悠起家,专找软柿子捏,看谁不懂行就多管谁要几块钱。尤其是钢化膜刚横空出世时,柳丽丽在顾客面前把它夸得神乎其神,说什么防割防划防弹防,要不是广场口地方小,她能跳着健美操叫卖。我偷偷监视过她两回,发现她贴一张钢化膜竟然要价三十!顾客问吓这么贵,她做出一副“竟然有这种疑问”的表情,说:“进价就二十五块,收你五块钱手工费还嫌贵?防爆的!”

在警务室里,我声色俱厉:“进价到底多少钱?”

“呃,被你识破了。只有二十。”

我看见她眼珠转了一下,再问:“你想清楚再说!地铁站这儿又不是就你一个贴膜的。”

“十块钱。”

“……”

“五块!”她坐在小马扎上托起腮帮子,一脸烦躁。

过了两天,柳丽丽又被举报了。我出去一看,鼻子差点儿气歪了。她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张行军床,上面摆满了充电器和耳机,看样子业务规模又扩大了。我气得指着她鼻子说:“你没事儿吧?!地铁口就这么打,你放一床在这儿像话吗?”

(选自《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好书分享 请您推荐



书香影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羊尖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不断整合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资源,依托文明实践阵地,探索出一条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

吴子歌

没有往事,人会失去故乡

韩浩月

最近,我的新书《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出版,这是一本与往事有关的“缓慢之书”。“往事”是个书面词汇,人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说出“往事”这两个字,但往事的确时常会出现在大家的交谈中,只不过有替代的用语,比如“过去”“从前”“曾经”“小时候”……

“往事”是个令人心动的词,在纸页上读到、在歌曲中唱到时,“往事”都能迅速营造出一种情境,激发出一种情绪。那种情绪弥漫在心头,扩散到脸庞,冲击到眼眶,整个人便随之柔和、惆怅起来。可见往事是有能量的,那是一种被积蓄、被沉淀的能量,随时在寻找出口,一旦被它吸引,就会让人坠入其中。

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才有往

事。我曾在十多岁的时候提及往事,便因此遭到了耻笑:“小小年纪,何来往事?”那一刻,我面红耳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触碰这个词。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说出“往事”的那个下午,我热血沸腾,内心汹涌澎湃,随后却是无限的寂寞,连院子里的树影都饱含失落的味道。

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对此情形有过描述,电影结尾时那个名字叫洋洋的孩子说: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听到这句台词时,我释然了——七岁的人,也是可以有往事的。或者说,无论年龄大小,有了心事的人,就有了往事。心事翻滚,便有了叠嶂,有了云壑,有了深沟,有了车辙……往事便有了具体的形状、色彩和滋味。

从往事中走出,如同穿过人海。距离拉开之后,这边孑然而立,那边一片静寂。人终将是走向孤独的吗?如果是,为何又常常回头在人海中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人海中的他们都是动态的,有的正向时光更深处走去,只留下背影;有的埋首原地,努力地生活;也有人转身或抬起头来,带着温暖的笑容,寻找与你视线对接的瞬间。如果不用分别,那该有多好?那样就不再有往事,彼此热爱的人,就会时刻在火热的现实中被锻造,被重塑。

往事如风,如云,如烟,如梦……在我看来,那些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也拥有我的一部分陪伴着他们;而现实中的我,也同样带着他们的一部分在生活。当我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那些通常被形容为遥远的、缥缈的往事忽然清晰、具体了起来。人不能总活在往事当中,可要是没了往事作为注脚,人也许会失去出处、根基与故乡。

震撼心灵的《左权家书》

巍然

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阅读了由左权女儿左太北编著的《左权家书》。该书包含左权抗战时期的家书、简传、领导人题字、家人回忆及纪念文章、陵墓照片等,虽然只有很单薄的百余页,但字字千钧,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左权家书虽历经70余载,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深情与信念依旧炽热,震撼心灵。家书中凝聚的精神与信仰,历久弥新,穿透纸背,激励后人。

1937年9月18日,左权率八路军渡黄河之际,于转战匆忙中给叔父左铭三复信。信中,他痛惜兄长早逝,家中支柱崩塌:“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恃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面对国家抉择,左权毅然写出本文开头的一段话。其“牺牲一切幸福,为事业奋斗”之志,振奋发聩,尽显左权将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一切的壮志豪情,令人肃然起敬。

两个月后,左权再致母亲家书。

左权首先用了很大篇幅向母亲介绍时局:“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掠,烧房子……实在痛心。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随后,剖析了抗日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政府(笔者注:国民政府)政策上的错误……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他们都不能接受。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同时,他向母亲表达了自己与共产党同志的坚定信念与决心:“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决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左权从1940年11月12日起,至1942年5月22日牺牲前夕,给妻子刘志兰(1917—1992)共写了12封信,现存11封。信中,左权对妻女的深情跃然纸上。他在最后一封中写道:“……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在

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与我一块玩着、谈着,真是快乐。”接着话锋一转,又期盼着团聚:“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但为了革命事业,左权又劝妻子要勇于割舍:“若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这些话语深情而悲壮,充分彰显了左权作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驱逐日寇,复兴中华。为此,他甘愿牺牲个人与家庭的一切。左权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亲情之上,其情其志,崇高至极。

左权将军家书,满载着对家的深情与国的忠诚,是革命先烈的缩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烈之魂如灯塔,指引我们立志、明德、成才、担责。其家国深情,我们誓将传承不息。今日中国,国富军强,盛世如愿。重读家书,除感动更添复兴伟力,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对先烈最好的缅怀,亦是对其精神遗产的绝佳珍视。

阅读,需要一扇窗

王奕君

一直觉得,阅读是件庄重的事,而凭窗阅读,更有一种仪式感。

少年时,我家住平房。床上方有一扇小窗,父亲订了很多杂志,放在窗台上。独自在家时,我爬上床,取下所有杂志,在床上铺成一片,挑着读。我的心像一个小小雷达,搜寻着我喜欢的文字。我读从维熙的《梧桐雨》,哭了很多回;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为爱情就是一份深埋于心底的凄美奢望;读完刘心武的《班主任》,我开始敬佩当教师的父亲。我还喜欢王安忆、王蒙、林斤澜、谌容等等很多作家……

读书累了,我从小小的后窗向外张望。那窄窄长长的胡同,偶尔路过的行人,树下翻阅的落叶,都恍若也有故事……

恋爱的季节,忽然读到何立伟的一句话:“古典悲剧往往就是这样——以男人的下跪伊始,以女人的下跪告终。其实我们吻着的,几乎都是善于撒谎的嘴唇。”这句话犹如疫苗,防护着我脆弱的情感。我当时想,如果有一天我被人抛弃还能镇定自若,我要好好感谢他。

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家里有一扇大窗,窗下摆了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排满了书。那时我喜欢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我最先读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我被情节追着快速读完,继而反思自己,为什么读得这样匆忙,难道阅读不需要掩卷沉思吗?又读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时,我觉得视野更加广阔,书中表达的爱与恨也更为深沉。

正巧这时,我看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她这样评价夏洛蒂·勃朗特:“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那些气量宽宏、胸怀广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我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积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截记的。”而谈到《呼啸山庄》时,她说:“促使她创作的动力并不是她自己所受到的痛苦

和伤害。她放眼身外,但见世界四分五裂,陷入极大混乱,自觉有力量在一部书里将它团在一起。这种雄心大志在整个小说里处处可以感觉出来——它是一场搏斗,虽然遭受挫折,仍然信心百倍。”这篇评论让我爱不释手,读了好多遍。至此,我所有的阅读局限与困惑,就都有了答案。

深夜静寂,窗外星辰满天。凝神中,那无数闪烁的星光之下,仿佛隐现着约克郡的那座牧师住宅,那偏僻的荒原与沼泽,那阴云密布的天空……阅读把我引领到另一个世界,而凭窗则铺陈出一片想象的空间。我像离不开阅读一样,也离不开延展想象的那一扇窗。

后来我又搬家,客厅里有一个飘窗,窗下仍放了我的书。我少年时关注过的许多国内作家,时隔多年,笔法更加老练。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诱发着我阅读的好奇心;读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时,我父亲正病重住院,我希望从她的悲凉文字中得到一些释怀与共鸣;最近又读了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感觉她的笔文更加老练,像水果熟透之后,散发着醇厚的香味。

我始终不喜欢电子书,也不喜欢听书。我喜欢纸的质感、墨的芳香。我喜欢坐在飘窗上,手里捧着书,就算是狂风呼号的隆冬,通透的玻璃也会把阳光的暖传递进来,而把寒冷和尘沙挡在外面。随心地阅读,没有什么功利,只是喜欢。读书时,觉得天地宽阔,心境悠然。有时把书扣在膝头,凝神于窗外,思绪和想象会被拉得很远,在无垠之中,长出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来。阅读,离不开一扇窗。凭窗而读,是一份逸致,也是一种仪式。

终将有一天,在时光的尽头,会隐约传来如杜拉斯那般的感叹“我已经老了”,那时的人生,将滤去浮躁,洗尽铅华。最长久的陪伴,也许只有一把椅、一摞书、一扇窗,和慷慨的阳光……